

## 欧亚主义与大国雄心： 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

葛汉文<sup>\*</sup>

**摘要** 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是其主要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土耳其部分政治思想传统的重新解读以及循此得出的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与谋划。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提出的改变无条件亲西方政策、修正与俄罗斯关系、拓展对中亚国家影响和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等主张,对冷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其雄心勃勃的政策主张与土耳其的实际国力和可用资源存在巨大反差。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土耳其 冷战后 对外政策

土耳其地处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黑海、高加索、中亚与中东的交集之处,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长期位处重大国际斗争的中心,不时卷入国际战事,一向是世界强国权势争夺的焦点。为求在这一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确保本国的生存发展进而展现民族抱负,土耳其早自在亚洲头几个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建成现代民族国家那个时候起,其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学者与国务活动家便从未停止过对于本国国际政治身份、地缘政治定位与应有对外战略的思考。冷战结束后,面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土耳其当代部分学者、政治家与军人,出于对土现行对外政策的不满,开始将部分地缘政治概念与土耳其历史上一些思想传统相结合,对新世纪里土与西方、俄罗斯、中东、中亚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谋划,力图以此作为土耳其当前外交政策的替代品。这些学者、政治家与军人的相关思考,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深刻地体现

---

<sup>\*</sup>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葛汉文,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三系国际战略教研室;邮编:210039;E-mail:gehanwen007@163.com。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冷战后世界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其国际政治意义研究”(批准号12CGJ022)的成果之一。

出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国内外局势与社会集体心态发生的剧烈变动,对当今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制订与实践形成了较大影响。

## 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兴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特别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一系列极富历史意义的新事态、新趋势,在显著或微妙地改变了土耳其社会整体精神氛围的同时,也为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历史与社会背景。这些事态或趋势包括:

第一,苏联解体对土耳其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冷战时期,土耳其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在阻止苏联权势南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土外部安全环境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昔日对手的消失,使得土耳其北部边界的安全压力锐减,“土耳其数百年来首次从对俄国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sup>①</sup>;不仅如此,苏联的解体导致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产生了一大批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土耳其存在紧密联系的国家,这便为冷战后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开启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领域,很多土政治家和学者很快就将该地区视为一个“充满机会、土耳其可以在此发挥重要影响的地区”<sup>②</sup>。与此同时,随着两大超级强国全球争夺态势的突然消失,原先在两极格局下长期压制的地区矛盾骤然升级。冷战结束至今,土耳其所在地区国际政治形势严峻:以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冲突为代表,土周边各个方向几乎都爆发了武装冲突,而叙利亚、伊朗、巴勒斯坦等周边毗邻国家更长期是冷战后国际斗争的焦点。面对这种矛盾纠结、异常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不少土耳其学者开始以极大的兴趣重新审视冷战后土外部安全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以求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里维系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进而实现大国抱负,从而为土耳其的未来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

第二,土耳其融入欧洲政策取得的成果与挫折。土耳其的亲西方政策由来

---

<sup>①</sup> Kiniklioglu S, Morkva V. An Anatomy of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07, 7(4): 534

<sup>②</sup> Aras B, Fidan H. Turkey and Eurasia: Frontiers of a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2009, 40(1): 200

以久。早自19世纪中期开始,奥斯曼帝国既部分开始了以西方强国为榜样的改革,并注意与一个或几个欧洲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以抵消外来威胁。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开展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同时,注意发展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冷战时期,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土耳其通过加入北约、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委员会等西方组织,正式加入西方阵营。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土耳其民众、特别是土政治精英都将土耳其视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部分,“‘欧洲定位观’已经成为了当代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主流”<sup>①</sup>。出于这种原因,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继续大力推动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关系。以1995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联盟(EEU)签署关税协定、1999年在赫尔辛基欧盟首脑会议上土耳其正式成为欧盟的侯选国以及2005年欧盟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为标志,寻求加入欧盟成为冷战后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主线之一。但近年来,土耳其入盟问题出现巨大挫折:欧盟向土提出的近乎苛刻的入盟条件,欧盟部分国家在土入盟问题上的激烈抵制态度,欧盟在库尔德、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等问题上对土耳其的指责和干涉,不仅严重阻滞了土耳其的入盟进程,使得土入盟前景愈发前途难测;同时也格外加重了土国内一些民众和部分政治精英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挫败感。部分土耳其学者开始据此质疑欧盟接纳土耳其的诚意,对土耳其近乎无条件的亲西方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纷纷要求精确算计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的利益得失,重新定义土耳其的国际政治身份,从而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重点进行恰当的修正。

第三,土耳其国内政治形势出现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1999年土被确认为欧盟侯选国后,土政府为达到加入欧盟的目标,根据欧盟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标准在国内展开了政治经济改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土耳其国内社会集体心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歧与大混乱,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开始对当代土耳其的政治身份(即土耳其到底是一个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与地缘政治角色(即土耳其究竟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sup>②</sup>

① 张学昆: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欧洲研究》2006(4): 46

② Bilgin P. A Return to “Civilisational Geopolitics” in the Mediterranean?. *Changing Geopolitical Imag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Geopolitics*, 2004 9(2): 269

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国内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往为政治精英与军队集团所垄断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也开始出现新变化:包括商业组织、民众团体、知识分子、智库等在内的土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开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政治倾向出发,提出了各种对外政策构想,并在土对外政策制订中竞相发挥着影响。

## 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思想渊源与当代表现

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实际上并无成体系的地缘政治思想可兹传承,它更多地表现为以一种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对土耳其自身历史上一些较为有名的政治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解读和演绎。出于这种原因,尽管在历史上包括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内的诸多地缘政治思想大师曾经对土耳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给予高度关注<sup>①</sup>,但对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发挥重大影响的,却是如“凯末尔主义”(Kemalism)或“欧亚主义”(Eurasianism)这类直接出自土耳其本土或在历史上曾与土耳其存在紧密联系的政治思想传统。

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来自于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思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与初步巩固的过程中,凯末尔确立了一个由六大基本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所组成的政治思想体系,将此作为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sup>②</sup>在对外政策方面,凯末尔本人在建国之初既宣布放弃原先在奥斯曼帝国政界一度流行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不主张恢复奥斯曼帝国昔日领土以谋强盛,转而奉行一种审慎的、中立的和以维持洛桑和约后土耳其国家领土现状为目标的政策,与东西方国家同时发展友好关系。自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凯末尔的政策思想长期主导着土耳其内外政策的制订与实践,但随着

---

① 例如,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奠基者、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其名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高度评价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他甚至将君士坦丁堡(即现伊斯坦布尔)称为“将西方和东方结合在一起,使海洋的自由永远渗入‘心脏地带’”的关键地区。见[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152。

② Akcalı E., Perincek M. Kemalist Eurasianism: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in Turkey. *Geopolitics*, 2009, 14(3): 55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结盟并加入北约后,土耳其的内外政策便开始明显偏离凯末尔当年的筹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出现的超级大国集团所引发的恐惧与孤立的气氛中,凯末尔主义的反帝内涵及中立的概念被放弃了”<sup>①</sup>。冷战结束之后凯末尔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更是全方位的:世俗主义原则因国内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和伊斯兰政党的空前活跃而受到严重挑战;革命主义原则早随着冷战期间土耳其加入西方阵营便不再为人所提及;经济的中央集权也因近年来土严格执行欧盟标准开展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几乎寿终正寝。在此局面下,土耳其国内部分拥护凯末尔主义的学者、政治家以及军队精英开始大力呼吁防止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对凯末尔主义的侵蚀,重新建立起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

这些学者、政治家以及军队精英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通过重新理解凯末尔主义精神实质之上。他们希望重新发掘凯末尔及其他建国先贤对于土耳其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的深刻思考,从而对当代土耳其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继续发挥有力的影响。

另一个对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形成发挥重大作用的,当属“欧亚主义”思想。欧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已告消亡,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以俄当代最为有名的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为代表,欧亚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又呈复兴之势,并以其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在俄联邦对外政策中发挥积极影响。<sup>②</sup>

冷战后欧亚主义的再度兴起,也引起了当代土耳其学者的充分注意。他们饶有兴趣地发现,欧亚主义中有关欧亚空间存在独特历史文化、要求加强欧亚民族团结以抗衡西方影响的论述,使其不能简单地将之等同于大俄罗斯主义。相反,欧亚主义大可同土耳其近代历史上一些曾经盛行的政治思想传统(特别是泛突厥主义)相融合,从而能够在当代土耳其对外政策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在

<sup>①</sup> Akcali E., Perincek M. Kemalist Eurasianism: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in Turkey. *Geopolitics*, 2009, 14(3): 554-555

<sup>②</sup> 有关欧亚主义与冷战后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介绍,见 Bassin M., Aksenov K E. Mackinder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 in Post-Soviet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s*, 2006, 11(1); Clover C. Dreams of the Eurasian Heartland: the Reemergenc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1999, 78(2); Laruelle M. The Two Faces of Contemporary Eurasianism: An Imperial Version of Russian Nationalism. *Nationalities Papers*, 2004, 32(1)

冷战后很多学者和政治家们的鼓吹之下,“欧亚”概念开始在当代土耳其政治话语中广泛出现。欧亚也进而被理解为一个实际包括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高加索部分地区、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乃至阿富汗北部在内的庞大空间区域。<sup>①</sup>包括拉马赞·厄兹(Ramazan Ozey)和穆斯塔法·耶尔马兹(Mustafa Yilmaz)等人在内,土耳其当代最有名的地缘政治学者都相信,作为欧亚的“枢纽”或“要塞”,土耳其必将凭借其位处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与中东交集之处的关键地理位置、自身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及其与该地区广泛分布的“突厥人民”在种族语言上的亲近感,在这个空间区域中赢得广泛尊敬并发挥主导性影响,甚至最终有望推动建立一个地跨欧亚大陆包括土耳其、俄罗斯、中亚诸国和伊朗在内的欧亚国家联盟,进而展现土耳其的大国抱负。<sup>②</sup>在他们的热情鼓吹下,作为一种混合了地理、种族与文化内涵的历史概念,欧亚主义在当代土耳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直接服务于土耳其大国抱负、相对模糊便却更具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话语体系。

### 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和筹划

冷战后土耳其部分地缘政治学者最为突出的政策主张,就是对土耳其亲西方政策的猛烈抨击。在他们看来,冷战后土耳其政府所奉行的无条件亲西方政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恶果,土耳其与其西方盟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发展之势:一方面,土耳其为讨好西方国家已经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土耳其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非欧盟成员国与欧洲经济联盟(EEU)签署关税协定、但却没有任何决策权的国家。正是由于该条约的签订,土国内大批中小型企业因无法与西方企业竞争纷纷破产,土耳其从欧盟成员国的进口额持续增长,在成为欧盟第六大出口目标国的同时,其债务也涨至58亿美元,经济状况不断恶化。<sup>③</sup>但另一方面,尽管欧洲很多学者政治家均承认土耳其加入欧

<sup>①</sup> Sengupta A. Heartlands of Eurasia: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al Space. Lanham: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9: 156

<sup>②</sup> Safrastyan R. The Concept of Eurasia and Turkey's Regional Strategies. <http://www.globalpolitician.com>

<sup>③</sup> Akcali E, Perincek M. Kemalist Eurasianism: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in Turkey. Geopolitics, 2009, 14(3): 559

盟对于欧盟的重大价值<sup>①</sup>,但部分欧洲政治家依然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似乎并不热心。欧盟也从未对土获得成员国地位有过明确的态度。

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土耳其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于遥遥无期的入盟前景似乎已经耗尽了耐心。他们特别反对土耳其在不是欧盟正式成员的情况下与欧盟签署关税协议,他们还反对欧盟主导的、旨在打击土耳其一些关键产业(如农业)的经济改革心怀不满,认为土耳其以经济自由化为目标的改革已经严重损害了土独立的经济体系,削弱了土的经济实力,这与凯末尔主义中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存在巨大冲突。另外,欧盟诸如“联邦主义”和“地区主义”等概念也受到他们的指责,他们将此与库尔德分离主义联系起来,将欧盟要求改善于库尔德人权状况的要求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强权干涉土耳其内政,甚至最终试图重演《色佛尔条约》分裂土耳其的企图。他们坚持认为,欧盟在接纳土入盟问题上从未具有严肃的态度,欧盟开出的政治与经济药方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接纳土耳其,而是力图缩小或转变土耳其一元化的国家结构,改变凯末尔主义长期以来作为土耳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最终使土沦为西方强国的经济与政治附庸。在这些学者看来,土耳其必须从这种严重损害土国家利益的亲西方政策转变为一种积极有力、基于国内和解基础上、在国内与对外政策之间取得平衡的大战略,这远比土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甚至更为紧迫。

当代土耳其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对于土耳其政府亲西方政策的批评,可以被理解是土国内传统政治势力对于土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一种抵抗。随着土耳其依据欧盟标准进行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不仅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功用(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控能力)正面临严重挑战,亦使得长期主导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原先不可挑战的权威性也受到巨大冲击。尽管如此,在当代土耳其,以凯末尔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政治经济规划依然被广泛信仰。至少是那些持保守立场、支持世俗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经济集权并大体上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特别是西方化政治经济改革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学者、政治家与军人,在“复兴凯末尔主义”的旗帜下建立起了一致立场,

---

<sup>①</sup> 例如,德国学者乌尔丽克·居罗特和安德烈亚·维特指出,土耳其对于欧盟的地缘战略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通过这一地区地理空间的开放,欧盟可以直接对危机地区(中东、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发挥影响”。见[德]乌尔丽克·居罗特,[德]安德烈亚·维特:《欧洲的新地缘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6):55

凯末尔主义也因此成为了这些学者、政治家与军人抵御西方化改革、欧洲定位政治认同的有力工具。

在批评冷战后土政府的无条件亲西方政策的同时,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还特别注意反思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着力探讨加强与俄罗斯关系、从而在土对外政策中平衡东西方关系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土耳其与俄罗斯(包括沙皇俄国、苏联)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时间悠长、异常复杂、冲突丛生的历史。

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为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反思土俄关系提供了契机。在部分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看来,早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包括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欧亚人民就有着相似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经验,这些国家人民相互团结共同反对西方列强组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中格外重要的部分。尽管在冷战期间,土耳其与苏联长期处于相互敌对状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威胁土耳其生存的主要敌人,或许也不再是妨碍土耳其实现大国抱负的障碍。相反,一个力图抵御西方强国经济与政治影响、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中极力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俄罗斯是值得土耳其人民钦佩的,而这种抵制也正是俄罗斯从苏联瓦解后的极度孱弱状态下逐步恢复其经济实力与自主权力的主要原因。<sup>①</sup>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认为,鉴于冷战后土耳其政府无条件亲西方政策所遭遇的极大挫败,土耳其必须着力加强与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的接触,此举不仅可以拓展自身的对外政策回转空间,还可加大土对西方国家的战略价值,反而更有利于实现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尽管如此,部分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实际上还是对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持一定的警惕态度。土当代政治学家真吉兹·坎达尔(Cangiz Candar)就警告称,基于两国在历史与地缘上的紧张关系,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注定要不同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是既在欧洲、又在亚洲发挥影响。从巴尔干到中国边境,它们在影响力上均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两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被控制但不可能消灭”<sup>②</sup>。土耳其如果过于强调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甚至进而与欧亚国家建立政治经济同盟关系,可能将引发一系列

---

<sup>①</sup> Akcali E., Perincek M. Kemalist Eurasianism: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in Turkey. *Geopolitics*, 2009, 14(3): 562-563

<sup>②</sup> Candar C., Fuller G. E. Grand Geopolitics for a New Turke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01, 12(1): 32



难以预测的恶果: 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 这个同盟可能将成为俄罗斯谋求恢复其传统的霸权政策的有利工具, 届时失去西方支持的土耳其无疑将再次成为俄罗斯全球野心的牺牲品。

冷战后几乎所有的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均热衷于探讨土耳其与中亚各国关系的可能前景。随着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 原属前苏联的一大批所谓“突厥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的出现, 立即激发出几乎土耳其国内所有政治派别的热情。土耳其是最先承认中亚诸国独立的国家之一。在此情势下, 土耳其绝大部分学者和民众, 均怀着极大的兴趣探讨建立一个自亚得里亚海延伸至中国长城的“突厥世界”的潜在前景。为了解释这一目标的合法性, 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特别要求重新理解凯末尔当年对泛突厥主义的压制态度。例如, 土政治学家坎达尔就指出, 凯末尔在上世纪20年代对于泛突厥主义的严肃警告和强力压制, 出发点在于避免因涉及苏联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主权而触怒苏联, 从而保证甫经成立的土耳其的生存,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 土耳其对于“国外突厥人”的政策需要重新加以解释。北方大敌的消失与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国力, 都为土耳其在高加索、中亚等“突厥人国家”中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因此, 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 “必须反映出它对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高加索突厥人、中国维吾尔人权利的关注”<sup>①</sup>。在这些土耳其学者看来, 如能进一步密切中亚“突厥人民”与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历史联系, 甚至最终推动整个“突厥世界”的重新统一, 将会对21世纪的土耳其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利益, 届时土耳其无疑将恢复其历史上一度拥有的无上荣光和世界性影响。

在冷战后土耳其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的政策主张当中, 中东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冷战结束后, 中东地区原先为两大超级强国激烈争夺所掩盖的矛盾骤然凸显, 中东地区形势和很多中东国家政局开始出现严重动荡。基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部分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开始对中东地区形势加以了更多的关注。这些学者指出, 尽管自1923年建国以来现代土耳其的世俗精英就严厉压制了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身份, 并长期将其中东邻国视为一种混乱与不稳定的来源, 采取

<sup>①</sup> Candar C., Fuller G. E. Grand Geopolitics for a New Turke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01, 12(1): 24

了一种主动疏远中东邻国、限制自身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政策<sup>①</sup>,但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不应过分排斥自身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国际政治身份。相反它更可作为一个在中东地区几乎唯一稳定的、民主的伊斯兰国家而自豪:土耳其完全可为该地区那些寻求改革和现代化的中东国家提供一个极好的样板。与此同时,土耳其在该地区当中相对强大的国力和较其他国家平稳的国内政治局势,完全能够在解决地区性问题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一道保证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这些学者非常小心地将土耳其扩大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之举与谋求地区霸权相区别,认为土耳其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旨在为那些寻求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伊斯兰国家提供一种不同的道路,在地区事务中扮演一种参与者、伙伴国与和平促进者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坎达尔就不无自豪地声称,土耳其自身的自由与民主进程将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更加自信地、更有原则地去追求国外利益,这完全有助于帮助中东地区从安全恐惧与彼此敌对当中解脱出来。<sup>②</sup>另外,这些学者还着重指出,鉴于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的跨国性质,土耳其国内形势的稳定与地区总体形势密不可分。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加大对中东地区国际政治的参与,特别是注重改善与发展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的关系,将肯定有助于土国内库尔德问题的最终解决,从而为土耳其最终实现大国理想扫除现实障碍。

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对于中东地区的极大关注,体现出冷战后土耳其国内社会对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新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在新的时代里土耳其国内社会对于“安全-威胁”概念的新理解。诚如土耳其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比伦特·阿拉斯(Bülent Aras)所言,在北方大敌消失的同时,冷战后的土耳其学者、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开始改变了对“威胁”的认识,土耳其开始将国内安全与地区安全相联系,将国家安全利益向本国边界之外延伸。其结果,则使得土耳其开始在中东地区事务中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土耳其传统的中东政策。<sup>③</sup>

---

① Tank P. Dressing for the Occasion: Reconstructing Turkey's Identity?.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06 6(4): 463

② Candar C., Fuller G. E. Grand Geopolitics for a New Turke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01, 12(1): 38

③ Aras B., Karakypolat R.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Frontiers of the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61(4): 478

## 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的特点、影响与国际政治意义

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和具有“现实政治”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与冷战后其他国家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存在一定区别,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引用和继承并不明显,它更多地体现为对土耳其一些政治思想传统的重新解读以及循此得出的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与谋划。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并非是一种建立在坚实逻辑基础上、由特定的概念与命题所构建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思想还是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色。首先在话语建构上,土耳其地缘政治研究尤其注重从本国思想传统中吸取知识养分,尤其注重发掘一些长久暗伏于土耳其国内社会集体记忆深处的精神信条为当前政策设计服务。例如,土耳其学者有关警惕防范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侵害土耳其国家利益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对历史上西方列强着意打击摧毁奥斯曼帝国的痛苦回忆以及凯末尔主义所蕴含的反帝传统;有关加强土耳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观点,大致继承了欧亚主义、特别是早先虽受土政府打击却长期未能完全消退的泛突厥主义的精神内涵;有关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显示土耳其大国地位的主张,则与一向隐含于土耳其社会的穆斯林归属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说,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对自身思想传统的固守多过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框架的吸取,彰显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为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案例。

其次,尽管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土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或筹划,但就其本质而言,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应被视为是对近年来土耳其国内形势变化的一种思想反应。在土耳其依据欧盟标准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于在转型过程中传统利益严重受损,从坚持凯末尔主义的职业军人到因抵制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土国内工商业从业者,土国内很多政治势力均对土耳其政府日益加速的融入西方政策表达出极度不满,这也正是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可以在当代土耳其社会取得广泛关注、并同时引发了土国内左右翼政治势力重视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视为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复兴,相反更多地将它视为一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致力于

固守传统政治经济模式的“反西方化”的政治话语。

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对于土国内社会集体心态和政治氛围影响颇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地缘政治话语在土耳其国内几成流行之势,很多土耳其的学术研究中心、智库、非政府组织、基金和学术期刊也都在热烈讨论土耳其对外政策转型的可能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右翼民族主义者,土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几乎都在致力于从地缘政治当中发掘出可供自己运用的政策主张:土耳其当前重要的右翼政治人物胡尼斯·多安(Hüsnü Dogan)便极力呼吁拓展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并计划筹建“欧亚党”以推动土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与此同时,土耳其老牌社会主义者、土工党主席多乌·佩林切克(Dogu Perincek)也将他的一部著作冠以“欧亚的选择-土耳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之名。<sup>①</sup>不仅如此,在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的热情支持下,自1996年以来旨在探讨欧亚主义、推动“国际欧亚运动”的国际会议多次在土耳其召开。在历次会议中,来自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所谓“欧亚国家”的代表与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政治人物、退役军人一起,就抵制西方国家的影响、加强欧亚国家主权和安全、促进欧亚国家团结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时至今日,土耳其已经成为“国际欧亚运动”最重要的学术和活动中心之一。

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对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实践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土耳其政府对其国际政治地位的表述已经愈发接近地缘政治学者的言论。1998年土耳其国防部长希克梅特·萨米·图克尔(Hikmet Sami Turk)就曾公开宣称,“土耳其不仅朝向西方,也与穆斯林世界享有传统联系。它根植于中亚、中东、安纳托利亚与欧洲。简言之,土耳其是一个欧亚国家”<sup>②</sup>。土前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也曾声称,“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加入欧盟,但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我们的目标是在欧亚成为决策中心”<sup>③</sup>。而据土耳其现任外长、土发展与正义党外交政策主要理论家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所言,“土耳其是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

①② Ruben Safrastyan. The Concept of Eurasia and Turkey's Regional Strategies. <http://www.globalpolitician.com>

③ Sengupta A. Heartlands of Eurasia: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al Space. Lanham: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9: 156

的交点,大体上处于欧亚的核心位置,位于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边缘地带的中间。”<sup>①</sup>正是在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视野引导下,冷战后土耳其政府已经有意识地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中东邻国与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其亲西方政策遭遇挫折时,土政府甚至开始通过向西方的传统敌国主动示好,以求平衡乃至要挟西方国家。例如,当前不久法德两国指责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无法满足欧盟要求、特别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公开声称“我并不认为土耳其可以在欧洲有一席之地”后,土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便对西方社会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措施提出置疑,并宣称土耳其将继续进口伊朗的石油。<sup>②</sup>在更为精细地算计其亲西方政策利益得失的同时,土耳其政府近年来谋求扩大在中亚、高加索等所谓“突厥”地区影响的企图也愈发明显。土耳其政府高官频繁访问中亚国家,2003年至2009年间土总理埃尔多安三次访问土库曼斯坦,两次访问塔吉克斯坦,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各一次。<sup>③</sup>另外,通过官方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局”(TIKA),土耳其自这些国家独立以来便向它们提供了大力援助,以显示“土耳其与这些‘兄弟国家’共享土耳其经济与政治成功经验的决心”。2007年土国际合作与发展局7.02亿美元总预算中的60%都被用以援助中亚和高加索国家,以促进当地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促进商业贸易、加强与土耳其大学的学术合作以及教授现代土耳其语等。<sup>④</sup>

但与此同时,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在土耳其国内社会与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在军事和经济上严重依赖西方的土耳其,与西方(特别是与欧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作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大多数土耳其学者承认,如果与西方国家及欧盟的关系出现大倒退,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日趋活跃的今天,一个被欧洲孤立的土耳其无疑将步向威权主义,国内局势将出现巨大混乱,从而沦入“中东化”的困局。与此同

① Aras B, Fidan H. Turkey and Eurasia: Frontiers of a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2009 40(1): 198-199

② Rusonik A. Turkey: East, West or Erdogan?. <http://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turkey-east-west-or-erdogan-4677>

③④ Aras B, Fidan H. Turkey and Eurasia: Frontiers of a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2009 40(1): 200

时,多数的土耳其政治人物还看到,在缺乏西方支持的情况下土耳其雄心勃勃的国家抱负将不会成功,土耳其也绝无可能在欧亚发挥主导性政治作用。这也是当前土耳其政府将欧亚政策置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之下的根本原因,土耳其更企图利用西方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以实现其欧亚雄心和国家抱负。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执政精英们无疑还希望通过在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地区积极发挥政治影响力,特别是支持上述地区民主化的发展,增加土耳其对于西方国家的战略价值,以同西方在一些关键问题(如加入欧盟)上讨价还价。<sup>①</sup>

冷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对外政策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转型时期,它还没能建立起一个相对成熟的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正是在这种充满巨大变数的复杂历史环境下,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的努力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具有大国雄心和辉煌历史的中等国家对于实现战略抱负的极度渴求。但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的很多政策诉求,在目标与可用手段上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应当看到:尽管当代土耳其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作为西方主导下的联盟体系中一个小伙伴国的角色,但由于国力的限制,土耳其同时也还远远无法以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身份对所在地区施加主导性影响,这也正是它仅能在“追随西方”与“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之间设法建立起一种大致平衡关系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代土耳其地缘政治学者所憧憬的对外政策构想、特别是有关发展并主导欧亚国家联盟的构想,显然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国家实力与可用资源,极为深刻地体现出当代土耳其社会在自身国际政治身份定位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大分歧与大混乱。而个别特别激进的政策论述,则充斥着明显的强权政治和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严重不符。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部分土耳其学者据此将其指责为一种“非理性的、与现代政治观念格格不入的落后观点,它更多地服务于狭隘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观点”<sup>②</sup>。这种说法虽过于简单武断,存在完全抹杀其存在的合理性一面,但无疑还是直接道出了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中存在的一些致命缺陷。

(责任编辑:张业亮)

<sup>①</sup> Candar C., Fuller G. E. Grand Geopolitics for a New Turke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01, 12(1): 37-38

<sup>②</sup> Akcali E., Perincek M. Kemalist Eurasianism: An Emerging Geopolitical Discourse in Turkey. *Geopolitics*, 2009, 14(3): 566